

陳布雷的風範

蔣 君 章

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故主任陳布雷先生，原是上海名人，與北方張季鸞齊名，當時有「南陳北張」之稱。但是他自從政以後，一直以作一個無名英雄自居，他的行動，絕不願意在報紙上披露。記得民國三十年的春天，布公養疴成都，去的時候，報紙上並無消息，兩個月後回來，只窄窄的一條：「中委陳布雷自蓉返渝。」這次的見報只是爲了要使關切他的朋友和接洽公事的人，有所便利。政治圈子中人或是新聞界中人，無不知曉布雷先生之名者。不過，今日的新聞界或政治上的後起才俊，或以布公之名相問，則知者實少。不願留名，是布雷先生的本意，我們不足爲怪。

總司令的私人秘書

布雷先生初識蔣總司令，是在民國十五年，被召見的地方是南昌。蔣總司令問他：「希望做什麼事？」他的答覆是願做總司令的私人秘書。蔣總司令便給他此項職務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成立，布雷先生就擔任第一處主任，先後幾二十年。侍從室第一處的職掌，凡是有關黨政各部門向蔣

委員長提出的報告或請示，包括情報在內，都由第二處先加整理或加註意見，然後呈核，故本質上還是蔣委員長的私人秘書。侍從室這一制度，在編制系統上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的。但是真正的性質，歷史上所罕見，勉強的作一比較，清代的軍機處有一點彷彿相似。布雷先生所職掌的範圍如此之廣，但是侍二處的組織，却是想像不到的簡單，工作人員，連同事略編纂室等在內，總人數不過五十多人。其精簡可以說達到了極點。布雷先生訓示我們：一個人要做兩個人或三個人的事；對外要嚴守機密，個人最好斷絕社會關係，凡進侍二處工作的人，一律要較原來職級低兩級，以磨練心志；在侍二處工作，大家一定要抱定做無名英雄的決心。這幾點，布雷先生都是以身作則地做到的。

無名英雄晝夜工作

布雷先生之佐蔣委員長，真正做到無名英雄的境地，他每天無晝無夜的工作，蔣委員長什麼時候都找得到他，照着工作的時間性，分別緩急，立刻非常正確的執行，他執行最高當局的命令，最正確，凡侍二處以「奉諭」方式發出的公文，

下面都註有「侍秘二」字樣，受文人一看這三個字，便知道這是委員長的真正意旨，奉行唯敬。因此，布雷先生如聞有人批評「偽傳聖旨」，雖非指他而言，但亦至不愉快。布雷先生要我們不與外界接觸，他也以身作則的這樣做。他對有關的會議，常以健康不佳爲理由而不出席。例如制憲國大開會時，浙江省籍的國大代表，都請他參加主席團，他特函秘書長洪爾友先生轉達謝意。函中說，國大開會除開幕典禮外，他都缺席，他的健康，不容許他擔任此項繁重的工作。浙籍國代，因此打銷此議。

由於布雷先生不常在公開場合出席會議，因此引起新聞記者的特別注意。有蒲熙修者，本「民主同盟」分子羅隆基的下堂夫人，時任重慶「新民報」採訪主任，特央陳立夫先生介紹，要訪問布雷先生。布雷先生答應了，約定時間，予以接見。蒲某很冒失的問他屬於國民黨中何種派系？他內心頗爲不悅，但却很幽默地答覆她：「這個問題，好比待字閨中的少女，有人問她：『你的愛人是誰？』她勢必難於答覆；我告訴你，國民黨中我的好朋友甚多。如張羣先生、吳鐵城先

生、陳果夫、陳立夫兩先生、陳誠先生、朱家驊先生等都是。一言下，就表示了他是國民黨中的超然分子，各方面他都很接近，這一迫人而來的問題，便在輕鬆愉快中，一笑了之。原來他的中心，只有一位蔣委員長。也由於他的超然地位，故常能調和各方面的意見，而歸到一個核心，故黨中人士，都以布雷先生的人緣最好稱之。

採取疏導解決學潮

當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期間，各地的職業學生，常受共黨外圍組織的民主同盟所策動，學潮時起，而以昆明為最。職業學生襲脅了一部分不明事理的學生，佔據西南聯大的部分校舍，儼然是一個獨立小王國，時作示威遊行，共黨報刊如「新華日報」等，更作誇大的報導，企圖煽動其他地區的學生響應。問題最嚴重的時候，蔣主席下令解散西南聯大，遣送學生回籍，由昆明駐軍負責辦理。命令下達後，蔣主席出巡平津，而教育部長朱家驊亦出巡離渝。布雷先生對此頗感懊惱，因為這個命令的如何執行和教育與軍事機關有關，教育部的意見尤為重要，而部長出差在外，無可商量，實使他為難。依照慣例，他可用奉諭云云的方式，把命令傳下去，便算已盡職責。但是執行的結果如何？頗堪注意；甚至蔣主席是不是真的要解散西南聯大？也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。布雷先生審察當時的情形，深知這是共黨有計劃的鼓動，以壯其在政協會議中的聲勢，如果解散西南聯大，則將授中共子鼓動各地學潮的藉口，也不是處理問題的上策。經深思熟慮之後，

他理解蔣主席這個命令，是在啓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，不一定要解散西南聯大。經提小組會議詳加討論後，採取下列疏導的方法：一、設法暗示各公正教授：最高當局有解散學校與軍事接管的策劃，爲了學校的前途，大家都應該挺身而出，疏導學生，不受襲脅；二、策動有家可歸的學生家長，召其子弟暫時返家，等候學校復課通知，再行到校；三、通知駐昆明部隊，作接管學校的準備。如此多方面配合進行，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們爲了學校的前途，不能不曉諭學生，發生極大的作用，使被襲脅的學生逐漸減少，最後只餘下極少數的死硬分子，只好自行散去，風潮得以解決。布雷先生處事之謹慎與細密，大率類此；爲蔣主席分勞解紛，也大率類此。

沒有私生活的要人

布雷先生的辦公室很簡單，無論在重慶或南京，他無晝無夜的待在一角小樓中，一邊是他的臥鋪，一邊是他的寫字桌，擺着幾張沙發和坐椅，都是極普通的，另外一張長的高枕沙發，那是他疲倦時休息之用，算是特殊的設備了。書桌置有普通電話和軍用電話各一具，蔣總統什麼時候有電話，他便什麼時候自己接聽，接着就是工作，需要我們協助時，便隨時召喚，絲毫不會耽擱。先生可以說是沒有私人生活的政府要人。在重慶時，夫人王允默女士住老鷹岩，先生有時返家，一宿而還。在南京時，王女士住上海，除了健康不支需要休養及陰曆過年外，絕不離南京一步。要是有私人享受的話，那只有聽一段南方滑稽的廣

播或與子女弟姪等閑話家常，但這些僅是工作之餘的小插曲而已。

布雷先生慣於主持小機關而不願意主持大機關，記得當行憲開始之時，總統府將正式成立，原任文官長擬就秘書長統轄整個總統府的一個新組織。一日，先生見召，歸時手執總統府新組織法草案，我們理會到這是奉諭研究的文件。先生執着這個文件搖頭道：「這樣一個龐大的機構，將如何做？」從這句話的語氣中，可能蔣總統在交給他研究時曾經作過某種表示，但先生始終不表同意，他自己願任國策顧問，其他職務都不接受。先生曾經對我們說過：他只願意作 *NO. 2*，不願意作 *NO. 1*。這是他的性格。這種性格之養成，非在人格修養到了最高的境界不爲功。

清慎自持身後蕭條

布雷先生個人生活，只靠一袋薪水和最高當局逢節的特別程儀，但在這種程儀中有時候還分一部分獎勵同仁。作者在三十四年的年節，曾經受到過這種獎勵，作者深知布公生活清苦，深深感謝，竭力辭却。他特囑翁秘書祖望先生轉告：這不是他的錢，是代替最高當局分發的，如不接受，那便是抗命了。他的至誠使我感動得流淚。最高當局也深知他的生活狀況，還都後曾發表他擔任中央日報董事長，他不受；後又命他任四明銀行董事長，他也不受。獨對中國文化服務社的董事長受而不辭，因爲文化服務社經費不足，無甚車馬費，而社長劉百閱先生曾任他的幕僚，故他接受了。（下轉第60頁）